

主持人语

近五年来，中亚政坛出现一系列积极的变化：2014 年，哈萨克斯坦制定了“光明之路”计划，准备大力发展国内的基建项目；2016 年，乌兹别克斯坦顺利完成政治过渡，新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上任之初便大刀阔斧地开展经济改革，极力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积极推动与大国之间的经济合作；2017 年以来，新上任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夫重提中吉乌铁路的建设，视区域互联互通为任内重要议题；2018 年 3 月，中亚五国领导人在哈萨克斯坦首都举行会晤，推动地区各国政治、经济关系改善。值得关注的是，上述各国均在不同程度上和不同领域中与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谋求对接。

与此同时，中亚各国面临的安全挑战依然严峻。首先，曾在中东参与战争的中亚籍极端主义分子因国际反恐力量增强及叙利亚政府军逐渐收复失地而呈回流趋势。其次，与中亚南部毗邻的阿富汗出现“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的活动，而美国总统特朗普释放的撤军信号更令阿富汗和平前景和中亚各国安全环境充满变数。再次，极端思想的产生与传播在中亚各国社会转型关键期构成潜在的威胁。地区安全是经济发展和中亚各国互信合作的基础。新时期中亚各国如何应对上述挑战？如何通过地区和国际合作机制保障安全？各国应如何在安全与发展两大议题之间保持平衡？

上述中亚各国在内政、外交与安全方面出现的新局面值得深入分析和探讨。本次工作坊旨在邀请国内长期跟踪中亚

问题的专家，研讨中亚安全与发展相关的重要议题，为政府和企业建言献策。

杨恕教授认为，中亚地区的安全问题不会出现重大变化。在对中亚安全的认识上我国受西方学术界影响太大，对水资源、边界、恐怖主义等议题的严重性有所夸大。当下中亚研究的领域太窄，且容易回避重要问题。区域和国别研究的中心目的是学术的，而不是智库的。孙壮志研究员认为，中亚各国当下的重点是完善权力结构、稳定政治局面。中亚各国的财政和债务情况值得关注，可以用控制力、执行力、凝聚力、抗震力四大指标来观察中亚各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状况。潘志平教授表示，当前中亚泛突厥主义再泛起。中亚各国去极端化任重而道远。美国当下在中亚的政策重点是对华施压。许涛研究员指出，中亚的地缘形势、大国博弈格局和各国民族要素基本没有变化。成为主权国家之后产生的边界、水资源分配等问题是主要的变化。常春教授认为医疗卫生合作是落实“一带一路”的重要抓手，可以有效提升文化影响力，为政治关系和经济合作提供支撑。张宁研究员指出，目前塔吉克斯坦面临的安全风险并不严重，极端组织的规模不大，塔国安全防控方面较为得力。目前主要的挑战在于去极端化。施越助理教授介绍了哈萨克斯坦经济改革的重点项目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表示我国参与中哈经贸合作的相关单位有必要关注该机构的发展，利用其提供的便利条件，提高项目合作质量。

与会学者认为，中亚地区的安全形势较为稳定，各国政治领域的重点是完善权力结构。传统中亚研究议题，包括水

资源、边界争议、恐怖主义等问题目前并不会对整体安全形势构成挑战。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增大的形势下，经济和民生领域的挑战较为严峻。

在对华关系方面，近期“中国威胁论”相关舆论和事件频发，与极端民族主义相结合的“泛突厥主义”有再泛起的趋势。这对“一带一路”框架下的经贸合作而言存在负面影响。

“一带一路”倡议下与中亚各国的经贸合作需注意国别统筹和廉洁反腐，警惕商业项目腐败对两国关系造成的负面影响。“一带一路”倡议可将医疗卫生和金融等领域纳入视野，结合各国和区域特点将合作领域多元化。

与会学者建议，区域和国别研究须以学术研究为本位，在推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为相关领域提供政策建议。在未来，“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将更为多元化，需要更多金融、法律、财会、医疗卫生、农业等领域的人才投身其中。

施越

2019年11月3日

“博雅工作坊”第25工作间

新时期中亚的安全与发展

2019年10月17日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安全与发展始终是国内学界探讨中亚问题最重要的两大主题。近年来，在中亚内外形势出现诸多变化的背景下，聚集国内该领域顶尖学者研讨中亚形势适逢其时。10月17日，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雅工作坊第25工作间以“新时期中亚的安全与发展”为主题，邀请11位专家学者从政治、经济、宗教、安全等角度围绕中亚地缘政治形势变化、中亚国家关系、中亚安全形势、中国与中亚地区合作等问题进行了一场跨学科的学术研讨。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钱乘旦在致辞中表示，中亚地区逐渐进入世界舞台中心，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此时讨论中亚的安全问题及时且必要。但我国对中亚地区的研究还不够，甚至还很薄弱。由于历史等因素的制约，许多人对中亚地区不重视、不了解。他指出，此次工作坊为中亚研究搭建了平台，邀请有关学者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面对面的讨论，希望大家能在学术交流和观点碰撞中产生思想的火花。

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所长杨恕教授发言的题目是《中亚国家地缘政治的基本特征及影响》。他指出，“新时期”概念在对外宣传中不宜使用，因为对象国没有这个概念。此外，我国中亚研究本就薄弱，研究队伍还略有缩小，但中亚和上

海合作组织在高层决策中又是重要领域，由此出现了不对称的问题。

他认为，在今后不长的时间内，除非国际上或中亚国家内部出现对安全环境不利的重大变化，中亚地区的安全形势将继续保持现状。他同时强调，我们对中亚地区安全的认识受西方学术界影响太大，在中亚安全问题、水资源及边界问题、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等问题上过分估计了其危险性，一些虚假的信息反而成为关注的焦点。

在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主义问题方面，他认为国内学界对塔吉克斯坦境内的恐怖活动存在误判，即有相当一部分人将武装反对派视为恐怖主义势力，但实际上不是。此外，他认为没有必要过分关心中亚国家的权力交接方式和结果，重点应是政策变化，而不是领导人的更迭。

杨恕表示，对于中亚安全问题要重视，但不宜过度重视。第一，中亚国家发生重大安全威胁的可能性不大；第二，一定程度上看，所谓的“颜色革命”没有影响到其他国家，但要重视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因为这一地区同新疆联系较多。中亚国家的伊斯兰化程度在伊斯兰世界里是比较低的，特别是在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这些地区。目前中亚的极端势力、恐怖主义势力和新疆的联系越来越少，中亚的中介作用基本上没有了。第三，中亚社会的不稳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济问题引发的社会安全问题。

杨恕指出，当前的中亚研究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研究领域太窄，目前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中亚国家对外关系或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关系上，其他方面涉及太少。二是西方对中

亚的过度评价影响到了我们对中亚的评价。三是对一些重要问题（如中亚地区出现的“中国威胁论”）的回避。四是中亚国家的权力交接问题，如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的权力交接形式，即先交一半、再交一半，以前没有出现过这个情况。五是要正确看待中国同有关中亚国家的关系，中国与中亚地区是否存在“丝绸之路的传统友谊”值得探究。

杨恕认为，推动中亚研究是一件好事，扩大了我国区域与国别研究的重要领域。与此同时，区域与国别研究的中心目的应侧重学术，而不是智库，它可以对我们现有的国际关系或国际问题研究进行重要的补充，但不能把智库研究作为主要方向。因为它涉及到科研方向和队伍培养，是很重要的问题，不宜以行政命令做统一要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发言题目是《当前中亚形势的新变化与中亚国家关系的新发展》。他表示，中亚研究的队伍确有萎缩趋势，高水平研究人员成长速度较慢，但有很多年轻人开始对中亚问题感兴趣，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希望借助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这个好平台，推动中亚研究取得更多成果。

孙壮志认为，中亚国家近年来受到关注一方面是由于其自身形势发展出现变化，另一方面是我国和中亚国家关系的不断提升。中亚地区是大国的博弈场，各方面因素在此碰撞，外部因素对中亚的稳定发展起着或积极或消极的作用。

他指出，对中亚国家的形势研究一般包括政治形势、经济形势、社会形势、安全形势和外交形势等内容。对某个国家局势的评价一般会特别关注领导层变化、体制改革、政治

力量对峙和较大的政治事件等。近几年中亚国家的基本趋势还是完善权力结构和维持大局稳定。目前中亚国家的政治是基本稳定的。

今年中亚政治的重大事件是纳扎尔巴耶夫的突然辞职，此外还有吉尔吉斯斯坦新老总统的“闹剧”，反映出其国内政治矛盾的升级。纳扎尔巴耶夫之所以选择托卡耶夫，一方面是因为他长期跟随自己，另一方面是因为托卡耶夫长期在国外工作，跟国内的利益集团没有联系，所以对他很放心。而吉尔吉斯斯坦因为有地区、民族等各种各样的问题，新总统为了自己的势力和集团利益难免会和前任总统翻脸。通过对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比较可以看出中亚政治的一些特点。

在中亚安全领域，目前受关注最多的还是三股势力，即非传统领域的安全问题，与此同时，生态安全、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问题也都很严峻。由于中亚国家的国防能力非常低下，因此还包括传统安全的挑战，需要借助国际帮助。

经济方面，中亚国家保持了基本的增长态势，但一方面要关注财政状况，包括外债水平，因为中国是很多中亚国家的债权国，过差的财政状况可能会引发债务风险；另一方面要关注通胀率。乌兹别克斯坦改革造成的高通胀是社会不稳定因素之一。此外，因为民生问题此前解决得不好，贫困非常突出，中亚国家也非常关注民生问题。

外交领域，要关注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变化和大国博弈给中亚国家带来的直接影响。最近中哈、中吉之间出现的问题都有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因为大国出现矛盾冲突时，小国

要站队。小国在外交上一方面希望寻求大国间的平衡，争取回旋空间，另一方面在地区合作上，又希望搭上大国的“顺风车”。中国是大国，虽然我们在经济投入上占的比重很大，中亚国家在经济上多少对中国形成了依赖性，但我们对中亚还没有形成一定的影响力，这是要解决的问题。

最后，孙壮志提出了评估中亚国家的四项指标，即控制力、执行力、凝聚力和抗震力。控制力决定国家能否正常运转，包括由国家建立的管理体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以及权力部门对官员的监督和控制。执行力是贯彻政策的程度，包括各级政府责任是否明晰。中亚国家保留了苏联的垂直领导体制，形成了庞大的官员体系，所以执行力主要是看行政效率。凝聚力主要看对国家的认同感。中亚国家是多民族国家，多种文化间能否相互包容，能否形成主流价值观，宗教作用和公民意识都影响着国家认同感。抗震力是应对危机和挑战的能力，即国家能否在第一时间把动荡限制在最小范围内，能否迅速使国家回到稳定状态。

新疆大学中亚研究院教授潘志平的发言题目是《新时期中亚安全形势几点分析》。他首先指出，吉尔吉斯斯坦的“8月事变”不是颜色革命，而是有南北矛盾背景的内乱。“颜色革命”是由西方特别是美国进行背后操纵的非暴力革命，而现在美国对中亚的兴趣不是很大。

潘志平强调了当前中亚地区泛突厥主义再泛起的问题，指出突厥语国家在苏联解体后组织了一个不定期、不成型的峰会，并于2011年开始机制化，主要由土耳其牵头，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参与。此外，他们编

的泛突厥主义的《突厥通史》已经成为中小学课本。哈萨克斯坦也有小动作：将南哈州撤掉建“突厥斯坦州”。

潘志平认为，中亚地区去极端化任重道远。中亚的伊斯兰化程度远不如中东，伊斯兰化问题主要是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南部，乌兹别克斯坦把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玛哈拉变成新玛哈拉，成为政府直接严格管辖的准社区组织，目前运转不错，但依然有风险。

中亚地区边界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哈俄北部边界问题，已经比较顺利地解决了；另一个是费尔干纳盆地问题涉及到大大小小的9个飞地。此前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冲突就与此有关，但这是边防警察的事，不涉及国防军，更谈不上军事对峙。

在美国对中亚地缘政治的认知方面，潘志平认为美国的态度正在从忧虑转变为焦虑。他指出，兰德公司20年前就称要保持美国至高无上的地位，不应允许中国壮大，哪怕是和平崛起。小布什在高加索和格鲁吉亚鼓吹过“颜色革命”。后来美国搞“大中亚计划”、“新秩序计划”。到了特朗普时期，美国已非常焦虑、不择手段。我们面临的挑战是特朗普的说到做到、不可预测，屡出奇招、险招、怪招、阴招。比如美国最近关注新疆所谓的“人权问题”，其国务卿找五国外长谈，称中国在新疆的行动与反恐无关，就是希望插手中亚，旨在搞乱新疆。

清华大学欧亚战略中心主任吴大辉教授以吉尔吉斯斯坦为例分析了“中国新威胁论”。

吴大辉首先指出，传统的“中国威胁论”发端于欧洲，

后来扩展到澳洲和美国。“中国威胁论”一般有四个方向：“人口扩张论”，认为中国人口太多，粮食不够吃要跑出去；“经济侵略论”，认为中国经济强了，成了经济猛兽；“军事威胁论”，认为最近十年中国军费增长太快；还有就是“意识形态扩张论”。

他强调，中亚地区的“中国新威胁论”和传统的“中国威胁论”不一样。比如在吉尔吉斯斯坦，目前两国关系可以说处于苏联解体后的最低点。新的威胁论存在三个视角，一是中国的腐败威胁。前不久阿坦巴耶夫被抓，涉及的罪名主要是在一些与中国有关的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腐败。由此，吉国内认为中国企业在吉的经济活动助长了腐败现象，认为中国政府纵容支持中国企业以不法手段获得经济利益。第二个视角是中国的债务威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这可能是最盛行的一种“威胁论”。吉国对中国的债务约 16.83 亿美元，占其外债总额的 44.7%。吉国认为已经超过了警戒线，以后很可能要“割地赔款”。第三个视角是中国的种族威胁论。新疆是跨境民族最多的地区，和五个中亚国家都有跨境民族。吴大辉表示，所谓“种族威胁”的逻辑在于吉尔吉斯斯坦认为新疆的反恐措施威胁到了柯尔克孜族的人权，如果吉国政府不干预，15-20 年后中国的柯尔克孜族将不复存在，随着中国的逐渐强大，已入吉国籍的柯尔克孜族问题会成为中国干预吉国政治的借口。

吴大辉最后指出，“中国新威胁论”会不断有新变种出现，不可能完全杜绝。中国企业“走出去”，最好的海外利益保护是遵纪守法。无论所在国市场发育是否成熟，企业都

应本着市场原则从事经济活动。在经济欠发达、政治转型存在变数的国家，重大基础建设项目需要慎之又慎，中国政府的作用终究是引导而非决断。此外，在处理事关跨境少数民族问题时必须具有国际眼光和外交意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苏畅的发言聚焦中亚伊斯兰激进主义的演变。

苏畅指出，激进主义是中亚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前传，是极端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激进主义演变的历史背景是伊斯兰复兴和巴以冲突，伊斯兰世界和西方矛盾深化，伊斯兰复兴的政治化特征更加明显，客观上对激进主义起到了激化作用。在外部伊斯兰复兴的背景下，中亚的激进主义开始萌生，在苏联入侵阿富汗时迅速发展。中亚伊斯兰激进主义虽然有着深刻的原教旨主义深意，但其内涵是政治性的，更多的是谋求政治目标而不是宗教意义。其发展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即上世纪 70-80 年代的萌生阶段。当时中亚激进分子的目标是苏联政府，他们主要通过宣传方式来抵抗无神论，活跃伊斯兰的复兴，并没有建立完整的组织和思想体系。70 年代末，中亚激进分子成立了革命组织，80 年代初，这个组织开始宣传带有激进色彩的思想，同时期中东的瓦哈比主义进入中亚并被一些伊斯兰教人士接受。瓦哈比主义中的一些政治主张与革命组织的政治诉求不谋而合。革命组织接受了瓦哈比的部分主张，并融合了穆斯林兄弟会的一些思想，希望在政治上获得一席之地。随着中亚激进主义的发展，瓦哈比主义成为革命组织的主体思想。在 70 年代

到 80 年代间，革命组织对中亚地区影响较大，费尔干纳地区一些精神领袖接受了瓦哈比思想，带着学生在中亚修建清真寺和宗教学校，传播瓦哈比思想，其中两个学生后来成为了中亚最大恐怖组织——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创始人。

第二个阶段是苏联入侵阿富汗导致战争的 1979—1989 年，10 年间激进主义得到发展。战争时期，阿富汗的抵抗组织对苏联军队中的中亚穆斯林士兵影响非常大，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宣传吸引了很多中亚士兵倒戈。战争结束后，中亚的穆斯林士兵将抵抗组织的激进思想带回中亚。可以说，阿富汗抵抗组织培育了第一批中亚伊斯兰激进主义骨干。在这一时期，阿富汗连接了中东的极端主义者和中亚的激进势力，推动了中亚地区民族主义的觉醒和极端主义的产生，终结了中亚与外部伊斯兰世界的隔绝。

第三个阶段是中亚国家独立后政治伊斯兰势力的崛起。政治伊斯兰势力是中亚国家独立初期的政治宗教组织，是激进主义向极端主义转变的重要载体。90 年代初期，有两大矛盾加速了激进主义势力的形成：一个是哈乃斐派和瓦哈比派的矛盾。80 年代末，中亚的瓦哈比派和传统的哈乃斐派在费尔干纳发生论战，这一论战很快扩大为宗教组织、教派间的对立，且越来越激烈。瓦哈比派坚决推动国家伊斯兰化，反对以色列人和无神论者。第二个矛盾是中亚国家各国政权和瓦哈比派的对立。例如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大部分穆斯林支持现政权，但费尔干纳的瓦哈比派继续煽动当地的穆斯林跟政府对抗。这种意识形态的对立很快演变成冲突。这些激

进势力建立了政党、社团，同境外伊斯兰组织建立联系，还参与地区运动。以政治伊斯兰为载体、由激进主义变为极端主义是中亚国家独立前后极端主义一个重要的演变过程。

第四个阶段是中亚国家独立初期政治伊斯兰势力由激进主义向极端主义的转变。在这一时期，政治伊斯兰势力发展很快，主要来自三个方向：一是带有宗教色彩的政治反对派，如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二是地方宗教势力，如费尔干纳的一些民间宗教领袖；三是 70-80 年代形成的激进势力，包括伊斯兰军、忏悔组织等中亚国家独立初期的一些宗教政党。他们的快速发展推动了暴乱的发生，如 1991 年的纳曼干暴乱标志着中亚的政治伊斯兰势力开始成规模地转向极端组织。从此以后，中亚各类政治伊斯兰势力开始使用暴力和政权对抗，且对抗越来越表面化、越来越激烈。1993 年起，大部分政治伊斯兰势力转到地下，有的到阿富汗组成新的恐怖组织。中亚国家独立初期是激进主义高涨并发生演变的时期。

苏畅指出，上述结论展现了该时期中亚国家政权与伊斯兰教派之间的关系以及哈乃斐派和瓦哈比派之间的对立。应当看到，这些意识形态的核心是中亚国家对发展道路的思考，带有鲜明的政治特征，是激进主义向极端主义转变的关键的因素之一。

对于中亚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关系，苏畅认为，激进主义本质上属于政治范畴，以社会思潮的形式出现和演变，形成了多种带有政治色彩的社会运动，其目的是通过激进方式参与国家政治，谋求建立以伊斯兰价值为主的政权。二者

有密切联系，但也有本质区别。主要区别有三点：一是思想来源不同。激进主义主要来源于原教旨主义思想和瓦哈比思想。极端主义主要是伊斯兰复兴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激进思潮以及中东和南亚伊斯兰极端组织中的一些思想理论，同时融合了中亚伊斯兰教本土化过程中形成的一些特质，其核心是瓦哈比主义和圣战思想。二是行为方式不同。激进主义较少使用暴力，以社团和宗教政党的方式呈现。它谋求参与政治活动，试图进入政治主流，左右国家发展道路。中亚极端组织的行为方式是实施暴恐袭击，目标是破坏中亚稳定，颠覆中亚政权。此外，两者在产生与发展历程上也不同：激进主义萌发于 70-80 年代，极端主义则是在苏联解体、中亚各国建立主权国家后的复杂历史条件下演变而来，并在 90 年代末达到高峰，以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中亚南部三国事件为标志性事件。2010 年后，随着中东极端主义高潮再次蔓延到东南亚地区，中亚激进主义再次抬头。

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的联系有两点：一方面，两种思潮都带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即以伊斯兰为旗号建立组织，把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作为目标之一；另一方面，它们在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极端组织只是吸纳了一部分激进主义势力，激进主义在今天的中亚仍然存在，且对中亚地区安全产生着影响。

对于激进主义政治伊斯兰势力和极端主义的相互关系，苏畅认为，激进主义是以政治伊斯兰势力为载体向极端主义转变的。政治伊斯兰势力既是激进主义向极端主义过渡的一种形式，也是二者的中介。激进主义由思潮演变成运动，其

中参与的要素就是政治伊斯兰势力，即中亚国家独立前后一些激进的、有强烈参政议政意图的政治伊斯兰政党和团体。

苏畅认为，当前极端主义之所以在中亚地区传播广泛，原因之一是中亚国家官方和民间对一些问题认识模糊，缺乏深入辨识能力。辨识能力是抵御极端思想、坚持正本清源的关键要素。各种与极端思想有关的社会思潮被混杂搅拌，中亚不同的社会群体对这些问题有不同的误解，加剧了中亚社会思潮的复杂化。社会形态的割裂甚至碎片化为极端主义、极端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对激进的穆斯林进行思想同化，不同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尖锐。中亚国家独立后，最复杂的问题莫过于对国家发展道路的思考。在传统社会解体过程中，本民族要树立什么样的民族精神也是他们一直思考的问题。

她指出，中亚国家的社会思潮是多元的，也是混乱的，对外部极端主义的抵御能力很有限。面对复杂深刻的社会思潮，需要研究清楚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中亚的传统社会对外部伊斯兰世界各种思潮的接纳程度是怎麼样的？在哪一类人群或族群中更容易被接纳？

第二，什么原因造成了中亚国家缺乏对各种思潮的辨别能力？

第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中有哪些内容被极端势力利用，混杂进极端理论之中，成为促进激进主义蜕变为极端分子的工具？

苏畅最后强调，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不是宗教。在错综

复杂的思潮之中，它们在激烈的政治冲突中形成了混杂的交界，如何理清和应对这个交界是个难题。对复杂交界中伊斯兰激进主义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相对于极端主义来说，激进主义传播更广，因为它往往不强调暴力，且使许多人对其合法性和道德性的认识模糊，更谈不上中亚国家对它在法理上的界定，从而增加了治理难度。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许涛的发言题目是《新时期中亚各国面临的地缘政治机遇与挑战——中亚各国独立以来地区发展要素的变与不变》。站在中亚国家即将独立30年的时间节点上，许涛研究员通过总结中亚社会发展和民族国家建构中的恒量与变量，回顾、评估和预测了中亚地区总体的政治经济形势。

许涛认为，“恒量”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它的基本的地缘形势。中亚国家是内陆国家，地处欧亚大陆最中心的区域。即便现在科技有了巨大发展，中亚地区地缘困境的基本形势却没有变，和世界沟通、对话的难度和成本仍旧比较高。第二，域外大国对中亚地区的多元影响也没有变，也可以说该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基本上没有变，这是考察其经济安全一个比较重要的领域和指标。第三，中亚本土的一些民族性的要素对民族国家发展的影响也没有变。即使是在21世纪的全球化时代，中亚地区传统的游牧、绿洲文明对社会、政治、经济的渗透仍然很顽固地存在并发挥着影响作用。这突出体现在中亚地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部族政治中，部族的意识高于民族，民族的意识高于国家，很多问题不是从国家而是从部族的层面解决的。例如，今年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权

交接冲突根源就在于家族利益、集团利益交割不顺利，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另外，包括中资企业、中资机构在中亚国家遇到的一些困境，与国家或政府间的很多障碍，都是在家族层面去解决，由此带来了很多后期合作的很多问题。

中亚地区发展的“变量”也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最大的变量是这些国家在世界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中亚各国取得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的地位，可以自主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国家模式及与这个世界及周边国家的关系。这个变量从 90 年代初到目前持续将近 30 年，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其次，大国对中亚地区的影响方式发生了变化。随着整个国际格局的变化，在俄英争夺中亚的大国博弈时代，苏联解体前甚至中亚各国独立的前 10 年和独立后的后 15 年，大国对该地区的影响方式都不一样。简单说，大国不仅仅要加强自己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经济存在和文化存在，更多的是要在区域的规则制定及发展方向的设计上进行博弈。第三，中亚各国之间的差异在拉大，各国之间的关系也发生很大的变化。特别是 2018 年中亚峰会的召开，重点提出要改善各国的关系，解决包括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边境领土问题和水资源问题等，标志着中亚国家的关系在持续变化。然而，过于复杂和重大的历史包袱，难以通过一次峰会就彻底解决，前不久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之间再次出现边境冲突，说明这些问题还会继续在中亚各国关系方面产生影响。虽然目前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但如果出现突发事件，导致某个国家失控或民族主义上升，就有可能引起地区内更大的反应。

许涛认为，总体而言中亚地区是在变量和恒量之间的相互作用下发展，在两种力的作用下会释放出很多能量，比如在内外政策上的变化，极端主义的产生，以及政权更迭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等。把握住这些主要的恒量和变量有助于今后相对准确地观察和判断中亚地区的发展方向。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常春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一带一路”视域下医疗卫生合作的机遇与挑战》，包括“一带一路”视域下卫生合作的必要性、“一带一路”国家卫生合作现状与挑战以及卫生合作的机遇与建议三个方面。

常春认为，在“一带一路”视域下进行卫生合作的必要性有几个维度。第一，健康与发展之间存在紧密的关系。《“一带一路”暨健康丝绸之路北京公报》提出：健康是发展的先决条件和结果。第二，在“一带一路”合作中，在特定的区域内会有一些自然性、疫源性疾病等地缘共性健康问题，而人员流动和开发建设可能会增加病原的流动性，给传染病爆发带来更多的风险。此外，贸易、产品交易引发人们行为生活方式、文化理念、饮食结构上的变化，可能会带来共同的健康问题，需要大家携起手来共同解决。第三，随着生活条件改善和经济社会发展，各国人民的健康需求增加，各国政府都把健康作为重要的政府投入领域和关注领域，既存在各自的问题，也形成了独特的经验和优势，各个国家交流、分享、借鉴，对促进“一带一路”全区域国家的健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目前“一带一路”卫生合作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建构在现有协同机制基础上的多边和双边合作；第二类是医疗、

公共卫生援助；第三类是传统医药合作，包括中医在海外的推广，对跨境医疗的支持等。比如哈萨克斯坦和中国的卫生合作主要在四个方面：一是医疗卫生机构和高校间的合作；二是包括私人中医诊所和跨境医疗在内的跨境医疗；三是中方主导的跨境远程医疗服务平台，辐射了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等国家的 24 家医院；四是中国建在霍尔果斯的康复中心，提供民族医药定向服务。

“一带一路”卫生合作也存在许多挑战。第一，政府间的合作相对较多，民间合作不足；第二，各国经济水平差异较大，对卫生的投入差别也很大，所以出现了各国的能力特点不一样，需求有差异；第三，语言不通给交往和合作带来了很大的障碍；第四是协调机制尚未落实。

常春认为，在卫生合作中，中国的愿景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考虑的是自身的安全与发展，希望提升软实力，推动落实“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学习借鉴、完善防疫等措施提高中国居民的健康水平；另一方面则是希望得到沿线国家的支持，赢得有关国家的民心 and 舆论支持，使合作共赢形象化。

当前“一带一路”卫生合作也存在很多机遇。首先，越来越多的国家响应了“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其次，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对这一合作非常重视，有积极的参与意愿；第三，医疗卫生援外和“一带一路”的卫生合作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最后，卫生事业有中国故事可以讲，也有广泛的卫生合作空间，包括传染病和非传染疾病、慢病的防控；妇幼健康，水、环境卫生的改善；卫生体系建设和全民健康覆盖；

人才的培养和研究合作；医疗设备和技術特别是远程医疗和合作办医；传统医药和中医的推广等。

常春对开展“一带一路”卫生合作提出了五点建议。第一，要把卫生合作上升到战略高度；第二，践行“将健康融入所有”的政策；第三，以需求为导向，与当地社会文化相结合，研究各国的实际需求，关注民众体验，赢得口碑和民心；第四，做好顶层设计，实现有序发展，开展务实合作，避免虚假繁荣；第五，国内各参与方应发挥自身优势，形成拳头产品，避免内部的恶性竞争。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宁介绍了塔吉克斯坦的安全形势。他表示，总体上看，塔吉克斯坦本土安全形势很稳定，爆发传统军事安全危险的可能性小，反恐反极端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根据塔吉克斯坦官方对本国形势的评估报告，他从三个方面介绍了塔吉克国内反恐反极端的形势。

首先，报告称目前有活动的恐怖组织主要分为三类，分别是伊斯兰复兴党、伊斯兰国和传统组织。伊斯兰复兴党在有合法地位时人数约4万，2015年被列为极端组织后，成为活动烈度最强的一个党组织。伊斯兰国在塔吉克斯坦境内没有从事太多的暴恐事件，主要是进行联络和宣传暴恐，对塔吉克斯坦在俄罗斯的移民影响非常大。此外，从塔吉克斯坦独立后就一直存在且影响力根深蒂固的传统组织，如伊扎布特、乌伊运、突厥斯坦运动、拉瓦宣讲等等，近年来也延伸出不少分支力量。

报告数据显示，发生在塔吉克斯坦的暴恐事件数量及规

模总体不大，但 2018 年发生了 873 起（暴恐）事件，逮捕 298 人，表明去年开始形势突然严峻起来。这其中既有伊斯兰复兴党被列为极端组织的因素，也有暴恐分子从中东回流的因素。此外，过去 6 年在中东作战的塔吉克斯坦公民有 1899 人，其中五分之一是女性，反映出近年来加入极端组织的女性数量大幅上升这一新形势，这也是安全部门一直将女性作为重点安全防范对象的原因。目前塔吉克斯坦境内的极端分子约千余人，在阿富汗北部和塔吉克斯坦交界地区的塔吉克籍的极端分子为 2500 人左右。需要注意的是，阿富汗北部有近 40 个暴恐训练营，主要是培训中亚地区的暴恐分子，对我国及中亚的威胁较大。

报告认为，近年来恐怖组织的主要活动地点集中在塔吉克斯坦东北部与吉尔吉斯斯坦交界的地区以及东部的巴达赫尚地区。主要的联络和宣传方式是通过互联网，主要的工作对象则是年轻人、妇女和亲属。最新的变化是他们采取“睡眠细胞”模式，即不活动不犯罪，对塔吉克斯坦安全形成了极大挑战。为打击恐怖活动，塔吉克政府也采取了很多防范措施，比如在清真寺安装摄像头，规范讲经，分类关押恐怖分子，清理整顿清真寺等。

张宁指出，目前塔吉克在反恐方面面临不少问题。一是相对于目前的安全形势，反恐力量比较薄弱，现有的人员装备跟不上，只能保证重点目标，一些薄弱地区仍经常发生暴恐事件。二是塔吉克斯坦过去的法律无法适应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修改程序的速度跟不上形势变化的速度，导致暴恐极端组织可以利用法律空白和漏洞获取较大生存空间。三是俄

美故意夸大地区安全风险，在当地进行地缘政治斗争，给反恐带来影响。四是随着哈吉（朝圣归来的人）人数的增多，他们在社区中有较大的影响力和威望，有可能成为宗教极端传播的有力渠道，也有可能成为反极端最有效的利器，如何做好他们的工作就很重要。五是由于腐败严重，政府部门可能与暴恐极端分子及犯罪集团勾结，甚至执法部门本身就会参与这些活动。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施越的发言题目是《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与中哈经贸合作》，主要内容包括中心概述、管理架构、中心运营现状、定位和前景四个方面。

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地处哈萨克斯坦世博园南区，最初是由纳扎尔巴耶夫总统作为哈国五项制度改革之一提出，是一个以英国法律体系为基础，集金融、债券管理、伊斯兰金融及金融科技等功能为一体的国际金融中心。中心于 2015 年筹建，于 2018 年 7 月 5 日哈萨克斯坦迁都 20 年纪念日开业。

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的管理架构顶端为管理理事会，其构成有很浓重的地缘政治的意味。理事会包括 1 名主席和 11 名成员，主席由现任总统担任，11 名理事会成员由总统任命，哈方成员 6 人，包括总理、副总理、国民经济部长、央行行长以及金融中心总裁；外方成员 6 人，两位来自美国金融机构，另外还有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总裁、俄罗斯 Yandex 公司总裁、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总裁和伊斯兰发展银行总裁。中心的日常运行由总裁负责，在一定程度上他可以绕开哈萨克斯坦央行直接向哈国总统和总理汇报，有相当大的

金融业务权限。现任金融中心总裁克利姆别托夫也是哈国年轻一代官员中的重量级成员。

目前，中心下设机构分为职能机构和业务机构。职能机构包括管理局、经管局、法院及国际仲裁中心。经管局主要管辖金融中心区境内的所有金融业务；管理局是管理经管局之外的其他业务，包括后勤和日常行政管理局。法院施行英国普通法，由 1 名法官和 8 名大法官组成。该法院不受理刑事或行政诉讼，主要受理金融中心下设机构之间的民事、商事之间的诉讼。

目前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的运营现状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阿斯塔纳和摩尔苏丹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迅速上升；其次，运营业务目前集中在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AIX），主要涉及股票和债券两大块业务，股东包括 AIX 中心自身、上海证券交易所、纳斯达克交易所、丝绸之路基金以及高盛。目前该交易所主要负责承销哈国国债及哈国企业私有化业务。此外，交易所还专门设有“一带一路”板块，一定程度上对接“一带一路”倡议，但目前还没有太多实质性的业务。另一重要业务是继续职业发展部，旨在利用国内外高等院校以及培训机构的教育资源，以金融中心为平台，培养哈萨克斯坦的会计金融、法律人力资源、信息技术、工商管理等领域的人才。目前该培训中心已经开设 200 余门线上线下课程，为超过 1000 名学生提供了包括专业技能和英语在内的培训。

对于金融中心的定位与前景，施越认为，首先该中心主要提供税收和签证发放领域的实质性优惠政策，在管理架构、司法体系和工作语言上全方位和英美体系金融中心接轨，以

相对优质的国有资产来吸引国际资本，进一步增强相关领域的竞争力，维持经济发展；其次，通过继续职业发展部培养国际化人才，提升哈国首都人力资源水平；再次，该金融中心将成为哈国产业多元化一个重要途经；最后，该金融中心关乎欧亚经济联盟内部的金融市场布局，如果稳步发展未来会成为辐射欧亚经济联盟的金融枢纽，吸引来自各国的资本到此投资。有鉴于此，中国有必要密切关注该中心的发展，积极发掘该中心平台对于落实中哈产能合作投资项目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潜在价值，将该中心未来发展路径和中哈两国的政治经贸合作相结合，为两国的未来发展奠定基础。

讨论环节中，与会者就中国与中亚在安全与发展方面的相关议题发表观点。苏畅：中亚国家的极端思想和极端主义活动受外部阿富汗问题影响较大，近年受“伊斯兰国”影响较大。9•11事件后的十年可被称为中亚国家的“安全十年”，该事件后中亚国家开始大力打击国内极端组织，很多极端组织逃到境外。与此同时，中亚国家开始用强硬手段治理极端组织和思想，恐怖活动和极端组织活动大大减少。以2010年到2011年哈萨克斯坦一系列恐怖袭击为标志，中亚的极端组织活动有抬头趋势，但主要势力仍然在阿富汗北部活动。2017年后，中亚的生乱分子主要回流到阿富汗地区，但因为经过“安全十年”，中亚国家无论是国力还是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经验都大大增强，因此生乱者回流到中亚境内的不是很多，主要还是在阿富汗活动。

中亚的暴恐袭击与中亚国家的反恐有直接关系。但同时阿富汗形势的变化、和谈进展程度、未来是否会发生（北部

地区的)内乱等问题也都影响着中亚地区恐怖组织的再次整合,并且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在阿富汗北部已经有了复出的态势。目前看,恐怖活动和极端主义活动在中亚不是很活跃,但通过网络传播的极端思想却一直受中东和阿富汗、南亚的影响较深。

杨恕:目前看,哈萨克斯坦与中国在医疗保健方面开展合作可能性大吗?

常春:我觉得各国的实际情况有较大的差别,不见得一定要进行制度上的合作,而是可以互相借鉴和参考。现在哈萨克斯坦全民免费医疗的财政压力很大,也在考虑搞个人投保。他们是可以参考我们如何解决医疗当中存在的问题的,或者说我们也可以借鉴哈萨克斯坦在全民免费医疗当中的成功经验。哈萨克斯坦对医院实行的是认证授权制,类似于我国的定点医保的资质。我觉得我们可以尝试建一家医院开出两类门诊,一类是获得哈萨克斯坦的认证做免费医疗,同时还可以开一些高端服务,以实现盈利。

苏畅:关于“中国威胁论”,我想换一个角度,从中亚国家内部去寻找一些原因。首先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中亚国家跟中国在市场理念上没有对接好。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很快建立了市场经济理念,但中亚国家的市场经济观念可能还需要培育,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出现矛盾和冲突。其次,中亚国家独立后经历了一个民族复兴的时期,带动了从社会领域到政治领域的排外心理。去年以来的反华浪潮本质上是反政府,原因在于权力交接过程中,社会矛盾突出,被国内的政治反对派抓住这些问题来操作一些反华和反俄的活动。最后

还有西方的操作。美国专门有一个媒体营计划，专门培育中亚国家媒体记者以及寻找适合在中亚国家建立价值观的新模式。近几次反华活动是美国的推动，加上哈萨克斯坦反对派，再加上抗议群体以及所谓的独立媒体，从而形成的反华反俄的活动。

潘志平：我同意你的想法。中亚国家反对派抓政府的问题一个是贪腐，一个是卖国，所谓卖国是跟中国“勾结”，他们经常把这个声音放的很大，一些媒体也非常恶劣，经常造谣。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施越在会议总结时表示，本次工作坊讨论的主题主要集中在地缘政治、中亚安全形势和“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中亚多元合作三个方面。在地缘政治方面各位专家都提到了俄美欧等主要国际力量在中亚地区的影响，以及各国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等在国家内外形成的约束。安全方面，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两国政权交接，土库曼斯坦保持长期稳定，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两国存在一些内政问题，但中亚整体安全形势目前相对稳定，主要压力可能来自极端分子。多元合作方面，在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增大的情况下，各国中央财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能源和矿产资源收益，民生问题带来的压力比较突出；在对华关系领域，“一带一路”项目的落实，尤其是各国的项目从能源扩展到其他的领域，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正面和负面的现象；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合作则是广阔的前景和可能的障碍并存。

施越指出，中亚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对于中国西部边疆安

全和维持国内稳定大局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对政治相对比较稳定的中亚来说，坚持发展是缓解民生问题压力，平衡国内政治势力，以及抵御外来思潮的重要抓手。所以在研判中亚地区形势时，不仅要关注中亚国家和国际力量之间的互动，也要关注内部格局的形势变化和经济形势的变化。这个视角同样适用于思考“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亚地区的落实。如何将某一地区的宏观经济形势和商务实践、专业实践相结合，可能是未来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个重要方向。对于中亚地区的研究也提醒我们，区域与国别研究终归是一个多学科知识交叉的领域，需要以一种相对合理的方式汇聚各个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解决一些比较迫切而且前沿的重大课题。未来“一带一路”工作更应以具体问题为导向，打破人文社科和理工农艺之间的壁垒，形成各专业之间人才的良性互动，共同推进新时期的外交工作。